

论党项西夏对“夷夏观”的认知与重构^{*}

孔祥辉

党项西夏时期“夷夏观”的演进是考察西夏与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重要线索。梳理 9—13 世纪的诸语种文献可见，党项拓跋氏从唐末定难军始便一直进行“华夏”正统的塑造，产生了有别于“夷狄”的族群认识。在立国前后，西夏对宋朝主导的“夷夏”秩序表现出强烈的抵制与排斥，并开始在传统文化中寻求有利于自己的“夷夏”观念。在对中华文化的吸收和认同中，其“夷夏观”呈现出从模糊“华夷之辨”到提倡“华夷同风”的演进趋势。随着后期多民族交往程度加深，西夏人还试图在“地域中心观”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夷夏观”。西夏时期“夷夏观”的演进与其主动追求中华正统的历史进程高度契合，为本区域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关键词 西夏 夷夏观 华夷同风 地域观 重构

作者孔祥辉，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副研究员。地址：西安市雁塔区长安南路 199 号，邮编 710062。

唐末至蒙元统一之前，北方各民族间出现了迁徙与交融的新浪潮，对传统以中原汉人为主导的“华夷”秩序造成巨大冲击。尤其在辽宋夏金之际，汉、藏、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多民族的交流交往使传统“夷夏观”发生变化。也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夷夏观”的演变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密不可分。^①此前，学界对辽金的“夷夏”关系及华夏认同等议题的研究已比较丰富。^②囿于史料及视角，既往研究尚未对党项西夏的“夷夏观”问题进行过专门讨论。

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不断深入，从多元视角阐释西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西夏法律文献词汇所见多民族语言文化交融研究”(22CMZ029) 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马大正：《从中华民族一词的产生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22 年第 1 期；段超、高元武：《从“夷夏之辨”到“华夷”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思想史考察》，《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 年第 5 期。

② 参见马赫：《辽代文化与“华夷同风”》，《民族研究》1987 年第 3 期；蒋维忠、安贵臣：《辽、宋、金、元时期各族的中华意识评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 年第 2 期；刘正寅：《试论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民族研究》2000 年第 6 期；麻铃：《金朝“夷可变华”及“华夷同风”的治边思想》，《社会科学战线》2008 年第 11 期；李玉君、孔维京：《士志于道——“华夷之辨”与历史文化认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 年第 2 期。

历程已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近来，有学者以“中国观”概念为主线，梳理了辽金西夏时期从“天下一体”到“中华一体”的演进过程。^① 史金波也从宏观上论述了西夏对“中国”的认同。他指出，宋辽夏金时期，以边疆民族为主体的王朝逐渐改变了传统的“华夷”观念，或倡导“华夷同风”，或否认本身为“夷”，其实质都是在否定过去“贵中华、贱夷狄”的观念；在探索新的“华夷观”和正统观时，开始把本民族及其他边疆民族纳入“中华”的范畴之内。^② 由此看来，“夷夏观”的演替不仅反映了西夏与多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也是探讨党项西夏对“华夏”认同的重要线索。本文通过梳理夏汉双语文献，试图厘清党项西夏在不同时期对“夷夏”概念的认知与理解。在西夏重构新“夷夏观”的视角下，探究其主动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

一、从定难军节度到“华夏”正统的塑造

辽宋夏金时期，传统“夷夏观”在边疆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碰撞、交流中产生了变化，探讨新的“夷夏”关系也成为研究这一时期多民族交融历史的重要内容。总而言之，契丹、党项、女真等边疆民族对“夷夏观”的重构是此阶段“夷夏”关系演变的主要特点。它既是对传统“华夷之辨”的革新，也是多民族交融和“华夏”认同产生的必然结果。从过程来看，当原先被视为“夷狄”的“边缘”民族成为统治阶层后，势必要打破以往由中原汉人主导的“夷夏”格局，并试图构建起以“自我”为中心的“夷夏”新秩序。在此进程中，“夷夏观”的演替往往又与边疆民族对中原汉文化的认同程度密切相关。如辽代“夷夏观”的演变即可分为初、中、后三个时期，其变化整体呈现出从自认“夷狄”到追求正统，再到将其他边疆民族视为“夷狄”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与中原文化在辽朝的传播和被吸收的进程相一致。^③ 从党项西夏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来看，其“夷夏观”的演变虽也有类似趋势，但与辽金“夷夏”关系的演进特点不尽相同。

西夏脱胎于党项定难军割据政权，想要探讨其“夷夏观”的变迁，就要追溯唐末以来党项拓跋氏对“王朝-藩镇”体系的认同过程。唐初党项诸部内附，在“华夷之辨”的影响下，唐朝将内迁各族视为“夷狄”，并采取羁縻政策加以牵制。随着多民族交往及汉化程度加深，党项人内部出现分化，摆脱“夷狄”身份也成为一些汉化程度较高部族的政治诉求。9世纪中后期，党项拓跋氏已成为党项诸部中最早汉化的族群，并逐渐发展为党项族的中心。^④ 同时，定难军政权的建立也为党项拓跋部主动打破“华夷”的区隔提供了契机，藩镇成为其维系正统的政治符号。从唐末到五代，定难军节度使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臣属”关系，使其始终在此地区维持了一定的政治特权，^⑤ 稳固与历代中原政权之间的“王朝-藩镇”关系也成为定难军节度使的必然选择。在追求政治认同的过程中，定难军李氏开始有

^① 参见马升林、彭向前：《试论辽宋西夏金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中国观”》，《宁夏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② 参见史金波：《论西夏对中国的认同》，《民族研究》2020年第4期。

^③ 参见郭康松：《辽朝夷夏观的演变》，《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④ 参见周伟洲：《唐末党项拓拔部割据势力的形成和发展》，《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

^⑤ 参见吴天墀：《西夏史稿》，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4页。

意识地自别于党项诸羌,^①“夷夏有别”的认知也使拓跋部与党项其他部族间产生了身份边界。与此同时，随着政治地位和权力的巩固，党项定难军政权也逐渐发展为中原王朝稳定西北“夷狄”的重要力量。

五代时期，定难军李氏在中原政权更替之际，以“统摄西北诸夷”为旗号，不断扩大其割据势力。后唐明宗长兴四年（933），“以延州节度使安从进为夏州留后，以李彝超为延州留后”。然李彝超拒不赴任，并上书言“奉诏除延州留后，已受恩命讫，三军百姓拥隔，未遂赴任”。^②在与中原王朝的博弈中，定难军李氏俨然自视为西北“戎狄”的领袖，甚至李彝殷以“夷人”折德扆亦为节度使，与己并列而耻之。^③后晋开运元年（944），彝殷统兵助攻契丹，被授为“契丹西南面招讨使”，成为传统“夷夏”秩序的“维护者”。可见，定难军李氏对“王朝－藩镇”体系的政治认同不仅固化了其有别于“夷狄”的身份观念，也促进了党项拓跋部对“华夏”正统的认同和追求。

近十几年来，陕西、内蒙古等地出土了大批五代时期定难军上层人物的墓志。从志文可见，叙述君臣之义和塑造身份正统已成为党项拓跋氏的共识，内嵌于方镇体制的亲属网络也帮助李氏完成了对定难军区域的整合。^④在这些墓志中，墓主人大多追溯其祖先为北魏鲜卑拓跋氏，这与唐代《拓跋守寂墓志》中追溯的“西羌别种”截然不同。^⑤虽有学者认为，这批墓志中的祖先追溯可能受到中古时期族群攀附同质化书写的影响，^⑥但不可否认，通过共同的历史记忆进行权力和正统的塑造，是此阶段党项拓跋氏维持“王朝－藩镇”格局的重要手段。

北宋建立后，李彝殷、李光睿等主动上表避宋宣祖、太宗之名讳，亦可视为其主动纳入“正统”的延续。尽管这些政治表达是为了获得割据权力，但华夏正统的塑造也使定难军李氏对“夷夏观”有了新的认识。宋初，李继捧献五州之地，太宗谓继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诸部？”继捧对曰：“羌人骜悍，但羁縻而已，非能制也。”^⑦其对话不仅强调了党项与西北诸羌的区别，也以此彰显了拓跋李氏在此地延续200余年的“正统”身份。此后，李继迁和李继捧之间出现分歧，定难军内部也对宋人将其视为“西戎”“夷狄”表现出强烈不满。正因如此，李继迁等人也不愿融入宋人主导的“夷夏”新秩序，并极力向西北诸蕃渲染其家族自唐以来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从继迁到西夏立国的三代，拓跋氏内部已不满足自称为李彝殷的后人，遂将唐首任定难军节度使拓跋思恭纳入自己的政治谱系。^⑧由此可见，党项拓跋氏在最初并未自视为“夷狄”，反而主动与之区隔，这与契丹、女真等民族有明显

^① 参见陈玮：《西夏番姓大族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版，第71页。

^② 《旧五代史》卷44《明宗纪》。

^③ 关于折氏族源问题，学界有党项、鲜卑两种观点。参见周伟洲：《唐代党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页。

^④ 参见周永杰：《西夏建国前党项拓跋氏的发展》，《历史教学》2021年第9期。

^⑤ 参见周伟洲：《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拔氏墓志考释——兼论党项拓拔氏之族源问题》，《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⑥ 参见尹波涛：《党项拓跋氏族属研究述评》，《西北民族论丛》第20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⑦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⑧ 参见陈玮：《西夏番姓大族研究》，第201页。

不同。定难军政权的存在使党项拓跋部始终自认为“华夏”正统，其对政权、族源和身份的正统性塑造也一直延续至西夏时期。

为稳固在西北诸蕃中的统治地位，定难军李氏一直强调其与“夷狄”的不同，这使本为同族的党项族内部出现分化，客观上加速了其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在与中原王朝的政治博弈中，党项拓跋氏极力稳固“王朝—藩镇”的体系，并且始终体现出对“华夏”正统的认同。从阶段性而言，党项拓跋氏对族源与正统的塑造促进了元昊立国后党项人自我意识的萌发，深刻影响了西夏时期对“夷夏观”的认知与重构。

二、从“华夷之辨”到“华夷同风”的演进

长期以来，涉及西夏的汉文史料和私人著述多被传统的“夷夏观”所支配，“胡虏”“夷狄”等“敏感”表达也被四库馆臣隐去，^①以致当下学者很难通过汉文史料去讨论西夏时期的“夷夏”关系。李继迁自立后，大部分的宋代史籍都将党项人书写为“夷狄”或“西贼”。尤其在宋对辽、西夏的军事征讨失利后，以“华夷之辨”和“胡汉对立”为特征的狭隘民族观严重影响了宋代朝堂和士大夫的政治倾向。在“四夷”林立的外部环境中，“夷夏”间的藩篱更加森严。鉴于宋夏间的局势，宋人在处理与党项的关系时也产生了“联蕃制夏”和“以夷制夷”两条路线，^②而在李继迁被袭杀后，后者明显为主流。宋朝“以夷制夷”的政策不仅彻底打破了党项拓跋氏自定难军以来塑造的“华夏”正统形象，也进一步加剧了党项及其他边疆民族对传统“夷夏之辨”的排斥。

元昊立国后，“西夏人”逐渐成为其地域内众多民族的共同身份，西夏对传统“华夷之辨”的抵制也达到顶点。因书写视角不同，宋代的史料常常将西夏纳入自己的“华夷”体系和“天下共主”的范畴中。尽管宋夏战争后双方罢兵和议，且西夏在政治地位、名号册封等方面都做了“妥协”，但元昊称帝与宋代“天下一主”的根本矛盾无法调和。最终，西夏将“天子”改称“兀祖”，才使宋朝士大夫找到了“天下”和“中国”的平衡。相较汉文史料，西夏文献则以“自我”的视角表述了西夏人对“夷夏”关系的理解。为模糊“华夷”之别，倡导党项文化与中原文化同具特色，西夏以“番字”和“番礼”对“华夷之辨”进行了回击。在西夏文字中，记录党项族自称的“𠥃”（番）和皇帝姓氏“𢙈”（嵬名）的构造中都有“𠥃”（圣）字，以示其神圣、高贵；而记录其他民族称谓的字则往往由“𧔸”（虫）、“𤊻”（犬、狗）等字合成，以示轻蔑。^③如西夏文字“𢙁”（汉），取“𢙁”（小）与“𧔸”（虫）组合，字面义释为“小虫”。西夏通过文化符号来否定以往“贵中华、贱夷狄”的观念，无一不体现出其对宋人基于族群的“华夷之辨”的蔑视。

11 世纪中后期，西夏社会经历了番、汉之间的文化变革，这不仅加速了党项文化与汉、

^① 参见邱靖嘉：《清修〈四库全书〉删改问题刍议——以校办〈三朝北盟会编〉为例》，《清史研究》2019年第2期。

^② 参见韩小忙、许鹏：《“联蕃制夏”抑或“以夷制夷”？——北宋前期赵宋对西北远蕃民族政策的再认识》，《宁夏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③ 参见史金波：《西夏文教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4页。

藏等多元文化的融合，也使西夏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底色。^① 西夏仁宗时期，仁孝皇帝尤为注重对河西士人的笼络和对儒家文化的推崇，并将儒家思想植入治国法度。西夏在中国历代王朝中首次尊孔子为“文宣帝”，^② 将儒家思想作为最重要的统治思想。在回击宋人“夷夏之辨”的过程中，西夏人也意识到传统的“夷夏之辨”是以“文野”之分为基础的，而“文野”之分又可以通过后天而改变。所以在探索新的“夷夏观”的同时，西夏人开始提倡“地丑德齐”与“华夷同风”，正如西夏文诗歌《夫子善仪歌》中所述：

羌汉番三一母生，语言不同地所分。愈西愈高羌人国，羌人国内羌文字；愈东愈低汉人国，汉人国内汉文字。自己语言自己爱，各个文字各个敬。我辈国野利夫子，天上文星出东方，引导文字照西方。擢选三千七百弟子皆端正，一国四方莫不求学入学海。皇天下各读各经各国礼。不合于羌羌归降；后土上各奉各业各国仪，招引汉人汉屈服。由此后帝族绵绵共听政，弭药儒层出不穷。各级诸司臣僚中，弭药司吏尤兴盛。其多至此汝试想：非夫子功谁之功？^③

在诗歌中，西夏人以对“夫子”的歌颂来强调“番汉羌”等民族同出一脉，^④ 三者只有地域高低之别而无贵贱之分。“皇天下各读各经各国礼”“各奉各业各国仪”，反映出宋人主张通过宣扬儒家文化以修德“诸夷”的路径在西夏的成功实践。此外，西夏通过认同儒家文化，学习儒家文化，自列于“华夏”正统之列，但同时也尊重境内多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可以说，无论是西夏对传统“华夷之辨”的排斥，亦是提倡的“华夷同风”，实质上还是对儒家文化的推崇，充分说明西夏是在中原文化的主导下完成的“华夷同风”。彭向前指出，西夏还在汉文化的浸染下参与了当时各少数民族对黄帝形象的塑造。西夏文献中所记载的黄帝形象有两种，一种是以颜色特征命名的“五色帝”，另一种则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西夏人为避免混淆，将前者译作“黄色帝”（麌麌），把后者译作“轩辕皇帝”（穀頃麌麌）。其实西夏对黄帝形象的塑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其从定难军以来“华夏”正统塑造的延续。通过对“华夏”始祖形象的塑造，党项拓跋氏将自己填入黄帝血脉网格的同时，也将其政权纳入“华夏”正统传承序列之中。^⑤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西夏在提倡“华夷同风”时也继承了既往“夷夏观”中的“文野”标准，并对其他民族进行了“华夷”区隔。如夏译汉籍《类林》中涉及“南蛮”“北狄”的表述虽全部采用汉语音译，但“北狄”的西夏语表述是“穀鎔”（北地），^⑥ 或意指北边的部族。不仅如此，党项拓跋氏在追溯族源的基础上，主动与羌人和横山党项等同源族群进行区分。如西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中记述：“西羌梗边，寇乎凉土，是夕亦大雷电，于冥晦中上现瑞灯，羌人睹之，骇异而退。”^⑦ 在西夏文献中，党项人将吐蕃称为“羌”或“西羌”，将横山地区的党项羌称为“山讹”。^⑧ 此前已有

^① 参见杜建录：《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西夏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③ 参见聂鸿音：《西夏文献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08—209页。

^④ “番”为西夏人的自称。

^⑤ 参见彭向前：《西夏文献所见黄帝形象研究》，《民族研究》2022年第1期。

^⑥ 参见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类林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页。

^⑦ 参见曾晓梅、吴明冉集释：《羌族石刻文献集成》，巴蜀书社2017年版，第1041页。

^⑧ （宋）曾巩撰、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卷20，中华书局2012年版。

学者指出，西夏统治者与“羌”人的区分标准并非民族，而是阶级，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① 从西夏文献可见，因政治区分而产生的身份排斥也使两个部族间的边界愈发清晰，“山讹”（牷秽）最终被演化为西夏人视角中的“异民族”。^② 显然，这与西夏自称“白上国”一样，^③ 都是其构建政权合法性和正统性的现实需要。

从“华夷之辨”到“华夷同风”的演进，是中华文化认同下西夏重构传统“夷夏观”的重要一环。多元文化交融使西夏打破了宋初以来的胡汉二元对立，对汉文化的吸收也使其冲破了“华夷”间的“文野”壁垒。所以，无论是西夏文献中的“北狄”还是“黄帝”，都体现了西夏时期传统“夷夏观”从认知到重构的演进历程。同时也要强调，西夏所提倡的“华夷同风”并不是从根本上否认传统“夷夏”关系的存在，而是通过“文野”路径的转化来否定由宋人主导的“夷夏”秩序。随着与多民族交往程度加深，西夏人也开始重新构建以自我为中心的“夷夏”新观念。

三、以地域中心观为基础的“夷夏观”重构

12 世纪初期，辽、北宋相继灭亡，原先由辽朝建立的藩属体系和宋朝主导的“华夷”秩序都被来自东北的“蛮夷部落”打破，女真入主中原给西夏带来巨大的冲击。北宋灭亡后，西夏仁宗在回应宋人讨金檄文时言：“孤闻丑虏无厌，敢叛盟而失信；骄戎不道，妄称好以和亲。始缘女真，辄兴残贼。”^④ 但因双方实力的差距，西夏只能以“事辽之礼称藩于金，且受割赐之地”，^⑤ 被迫在政治上成为金朝的藩属。至 12 世纪中期夏金划定疆界后，西夏缘边已形成新的族群分布格局。其北邻克烈、乞颜等蒙古诸部，西接回鹘、西辽，东靠横山羌、女真，南毗吐蕃。在与这些部族的接触交往中，西夏人逐渐产生了新的族群认同，自认为比周边民族有“文明”之优越，可延续“华夏”之正统。王善军指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逐渐形成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但这种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实质上是一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⑥ 在“正统观”的影响下，西夏人也将“夷夏观”中的“夷狄”概念赋予缘边各民族，并把一些“低级”的民族称为“蛮夷”。

在西夏文献中，西夏人将契丹、回鹘、蒙古等部族都视为“蛮夷”，如西夏文《文海》对“彊”（夷）字的注解即为“九姓回鹘契丹等之谓”。^⑦ 西夏将这些部族称为“夷”的同时，也用“羶”（犬、狗）的字义创造了新的族群称谓词“羶羶”（指鞑靼）。此外，在西夏王陵中发现的部分夏汉碑文中记述了“大破之虏”“并吞八荒”“三年西戎”“戎夷匪……

① 参见周伟洲：《唐代党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1 页。

② 参见孔祥辉：《族群称谓所见西夏与多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交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3 年第 1 期。

③ “白上国”为“尚白之国”的意思，西夏统治者以白色作为政权的标志，是在承袭和利用“阴阳五行说”来加强和提高自己的统治地位，以此树立“西朝”的形象。参见吴天墀：《西夏史稿》，第 333 页。

④ （清）周春著、胡玉冰校补：《西夏书校补》，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1436 页。

⑤ 《金史》卷 134 《外国上西夏》。

⑥ 参见王善军：《20 世纪以来辽金民族融合问题研究综述》，《西夏学》第 6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

⑦ 参见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52 页。

猖獗”等字句。在7号陵（即仁宗皇帝寿陵）出土的汉文残碑中还有“北塞鞑靼……变俗用夏”等语。^①随着10—13世纪多元文化的交融，契丹、党项、女真等边疆民族也在“华”与“夷”的互动中意识到，既然“夷”在接受“华”的文化后也可以变成“华”的一部分，则所谓的“正统”也并非“华”的专权。^②通过文野之间的转化，西夏人也可以继承“华夏”正统，并将处于“文明”边缘的其他民族纳入由自己主导的“夷夏”关系中。碑文所见，西夏人欲以自身文化来“德化”鞑靼等部族，正是其重构“夷夏”关系的重要体现。

“天下”与“四夷”原本是由中原传统“夷夏观”而衍生出的地域和族群的认知，以“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来泛化少数民族的观念也是传统“华夷之辨”的具体表现。实际上，西夏人在族际交往中也会以“某某人”或“某地的人”来指称周边的部族。如西夏文诗歌中以“𢙎𦵈”（西主）和“𢙁𦵈”（东主）来表示吐蕃人和汉人；前述“𢙁𦵈”（山讹）的字面义即为“在山区的人或山上的人”，西夏文献中用于指称横山地区的羌人。^③在特定的族群分布格局和地理环境中，西夏人也试图构建“天下”和“四夷”的关系，如西夏文献中也出现了“𢙁𠂇”（东夷）、“𢙁𢙁”（西戎）、“𢙁𠂇”（南蛮）、“𢙁𢙁”（北狄）等表述。可见，由“地域中心观”而产生的族群认知是西夏建构“夷夏”新关系的重要基础。

在与周边民族的接触交往中，“四夷”的概念不断具体，这表明西夏所主导的“夷夏”秩序观也在逐渐形成。梳理西夏文献可见，西夏对传统“夷夏观”的重构大约成熟于12世纪晚期。在13世纪初期编写的西夏文法典《新法》和《法则》中，凡涉及回鹘、鞑靼、山讹、契丹等族群的表述则直接以“夷类”相称，西夏语“𢙁𢙁”（夷类）即为“夷人”。^④在西夏文兵书《将苑》中，党项人将原有“四夷”篇目删去其三，仅留“北狄”来指称北方的蒙古诸部。^⑤西夏文诗歌《夏圣根赞歌》中更是直言：“四方夷部遣贺使，一中圣处求盟约。”^⑥这首诗从党项祖先的起源一直叙述至四方来贺、国泰民安，也正是西夏后期试图构建的“天下”与“四夷”格局的缩影。

辽宋夏金时期，契丹、党项、女真等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后，纷纷效仿中原王朝建宗庙、承古制、创文字，并在多元文化的交融中产生了优于周边民族的身份认同。各少数民族在构建新的“夷夏”格局的同时，也不自觉地加深了对中华文化和“华夏”正统的认同。整体来看，认知和重构是党项西夏时期“夷夏观”演进的主要特点，这一时期“夷夏”关系的变迁不仅体现了党项对中原汉文化的吸收，也与西夏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高度契合。

^①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等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9册《金石编·西夏陵残碑卷》，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33页。

^② 参见陈跃：《论中国古代“大一统”内涵的发展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1期。

^③ 参见[俄]克平、龚煌城著，彭向前译：《诸葛亮〈将苑〉的番文译本》，《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④ 西夏语“𢙁𢙁”条。参见韩小忙：《西夏文词典（世俗文献部分）》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752页。

^⑤ 参见[英]高奕睿著、吴宇译：《西夏的北邻》，《西夏研究》2020年第4期。

^⑥ 参见聂鸿音：《西夏文献论稿》，第192页。

结语

传统“夷夏观”的演变是辽夏金时期边疆民族政权延续“华夏”、克承正统的政治需求。所以，无论是对“夷夏之辨”的排斥或对其正统性的塑造，这一时期“夷夏观”演进的实质都是统治阶层需要掌握“夷夏”新秩序的话语权。此过程中，新兴民族往往会忽略既往的“华夷”概念而强调对“正统”和“天道”的继承，并以建立新的“夷夏”秩序为目的。在重构“夷夏观”的同时，边疆民族也都将自己视作“华夏”正统，而将周围其他的民族比作“蛮夷”，这不仅加速了非汉民族对“华夏”的认同，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可见，当原有的藩属体系和“夷夏”秩序被打破后，西夏人也将回鹘、鞑靼、契丹、山讹等“低级”民族纳入自己的“华夷”体系，并试图重构以自我为中心的“夷夏”新秩序观。总之，重构“夷夏观”的过程既是党项西夏不断吸收儒家文化的过程，也是其主动打破胡汉二元对立，积极融入中华文化，获得中华认同的重要标志。经过党项西夏时期的族群整合，西夏境内的众多民族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以儒家文化为底色的区域文化体系，这也直接促进了元代大一统后本区域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本文责任编辑 樊志强]

·书讯·

郭胜利著《近代西北“改土归流”研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24年6月出版，全书约21万字。该书内容除绪论外，共有十一章，分别是清末西北社会问题与改土归流政策试行、民国政府西北改土归流的思想基础、民国西北土司制度及其演变、杨增新时期新疆改土归流、金树仁时期新疆改土归流、民国宁夏改土归流、民国青海民族社会生态演变、民国青海地区改土归流、民国甘肃改土归流、盛世才新疆改土归流、民国政府西北地区改土归流与边疆社会。该书系统梳理了近代西北地区“改土归流”历史进程，揭示了西北地区民族社会近代化改造的本质与规律，进一步完善了近代西北土司制度研究的学科结构与理论体系。

Abstracts

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Borderland Stud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ree Major Systems" for Borderland Studies

..... Luo Qun Hu Pengfei (1)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borderland studies represents the overarching objective and requirement of Chinese borderland research. This endeavor is intrinsically link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academic framework,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borderland studies, with talent cultivation serving as the pivotal element. Building upon the profound historical legacy of borderland research and addressing the urgent needs of borderland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it is imperative to establish Chinese borderland studies as a first-level discipline, refine its academic research system, reshape its discourse framework, and uphold the cultivation of high-quality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borderland studies will provide historical insights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contemporary borderland governance.

Key Words: Chinese Borderland Studie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Three Major Systems" Talent Cultivation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Borderland" in Early China before the Zhou Dynasty

..... Han Jianye (13)

Culturally, Early China refers to the cultural community formed through interactions and integration among various regions of China prior to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also known as the Early Chinese Cultural Sphere.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reveal that as early as the embryonic stage of culturally defined Early China over 8,000 years ago, its scope already encompassed areas such as Liaoning, Inner Mongolia, Gansu, and Guangxi. By approximately 6,000 years ago, regions including Jilin, Xizang, and Yunnan had gradually become integral parts of culturally defined Early China. Around 4,000 years ago, most areas of Heilongjiang and Xinjiang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is cultural sphere. It can be argued that by the Xia and Shang dynasties, the continental territorial extent of culturally defined Early China largely coincided with contemporary China's land borders, with some areas extending even farther.

Key Words: Pre-Zhou Period Culturally Defined Early China Politically Defined Early China Borderland

Borderland Archaeology within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Borderland Studies

..... Zheng Junlei (23)

Borderland archaeology within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borderland studies should focus on core propositions such a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ical territory of China's unified multi-ethnic state,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ncient borderland ethnic groups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ncient regional cultures in borderland with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dditionally, it should demonstrat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applied research fields and concrete work, particularly in establishing accurate understandings of borderla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The conscious integration of borderland archaeology into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borderland studies will also contribute to the in-depth research of Chinese borderland archaeology.

Key Words: Borderland Studie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Borderland Archaeology Fundamental Research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 Tangut-Xixia's Percep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Yi-Xia Concept"

..... Kong Xianghui (35)

The evolution of Tangut-Xixia's "Yi-Xia concept" (夷夏观) provides critical insights into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anguts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Multilingual sources from the 9th to 13th centuries reveal that the Tuoba clan (拓跋氏) of the Tanguts consistently pursued the construction of "Huaxia (华夏)" orthodoxy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ingnan Army in the late Tang, developing a distinct ethnic consciousness that differentiated them from "Yi Di (夷狄)". Before and

after founding their state, Xixia exhibited strong resistance to the Song-led Yi-Xia hierarchy, while seeking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Yi-Xia concept within traditional culture that favored their position. Through cultural assimi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ir Yi-Xia concept evolved from initially blurring “distinction between Xia and Yi” to advocating “shared customs between Xia and Yi”. With deepening multiethnic interactions, the Tanguts later attempted to construct a new Yi-Xia concept based on a “regional-centric view”. This evolution of Yi-Xia concept during the Xixia period aligned closely with Xixia’s active pursuit of Chinese orthodoxy, laying important foundati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a regional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Xixia Yi-Xia Concept Shared Hua-Yi Customs Regional Perspective Reconstruction Coexistence of Han and Fan Peoples and Military Security: A Study on the Tuding System in Southern Luzhou during the Mid-to-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ao Qianhua (43)

The Tuding (土丁) were local ethnic militia forces recruited through land management systems, constituting registered regional military units under state administration. After the sixth year of the Xining era of the Song Dynasty, as the Liao (僚) people stabilized, the Northern Song government lifted restrictions on land transactions in southern Luzhou while incorporating Liao people as registered “Shuhu” (熟户) under Bianhu Qimin (编户齐民). On this basis of land control, the state utilized land resources to organize indigenous militia forces. During the Yuanfeng era (1078-1085), male adults from acculturated households were formally organized into the “Yi Yijun” (夷义军), structured as command-level units and funded by local finances, and centrally registered in the state’s military rosters. During the reigns of Zhezong and Huizong, the establishment of Baozhai (堡寨) and the submission of the Wuman (乌蛮) tribes enhanced regional stability in Southern Luzhou. To enhance the defense capabilities of these fortresses, the Northern Song government allocated land as identity plots for new indigenous militia recruits, implementing a system that combined military service with farming, and transitioning to the “Shengbing system” (胜兵制). The development of Luzhou’s indigenous militia system reflected not only military pressures but also close connections with land policies, demonstrating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agrarian economies and borderland military security.

Key Words: 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 Coexistence of Han and Fan Peoples Luzhou Yi Yijun Shengbing

The Borderland Inspection System and Northwest Borderland Defense in the Mid-to-Late Tang Dynasty Tian Yaning (56)

Borderland inspections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manifested in three forms: inspections by borderland inspection commissioners, prime ministers serving as military governors, and inspections by regional military governors. As the primary mechanism, borderland inspection commissioners first emerged during Jingyun era of Emperor Ruizong’s reign, continued under Emperor Xuanzong, and after disappearing from historical records during the reigns of Emperor Suzong, Emperor Daizong, Emperor Dezong, and Emperor Shunzong, the system was reinstated after Emperor Xianzong’s reign. These borderland inspection commissioners were typically mid-to-high ranking civil or military officials, occasionally eunuchs. The inspections by prime ministers serving as military governors originated in the tenth year of the Kaiyuan era during the Emperor Xuanzong’s reign with Zhang Yue’s appointment, while inspections by regional military governor only appeared after An Lushan Rebellion. These complementary mechanisms formed a comprehensive borderland inspection system that played a measurable role in the northwestern borderland defense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Tang Dynasty Borderland Inspection Commissioners Regional Military Governor Northwestern Borderland Defense Uighur

A Study on the Newly Discovered Tang Dynasty Documents of the Yiwu Army from the Baidun Beacon Tower in Hami, Xinjiang Wang Yongqiang (67)

The Yiwu Army (伊吾军) was established in the fourth year of the Jinglong era and relocated to Ganluzhen in the sixth year of the Kaiyuan era. It administered several beacon towers including Muxu Beacon, Duluo Beacon, Sudu Beacon, Gaotou Beacon, as well as outposts like Wugu Station and Guduolu Station. In 2021, the Xinjiang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conducted field surveys of beacon towers in Barkol and Yiwu, identifying 20 Tang Dynasty beacon towers under the Yiwu Army’s jurisdiction. Among these, an official document was recovered from the Baidun Beacon Tower. Dated to a specific year in the Kaiyuan era during the Tang Xuanzong’s reign, this